

●文榕生

回首图书分编研究 90 载

ABSTRACT The status of China's 90 — year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is reflected by the amount of papers. The author group, the class headings, etc. The paper also analyses the new features of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lassifications; linkage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catalogings; the research work gets deeper and more detailed. 33 refs.

SUBJECT TERMS Book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History—China
Library research—Round-ups

CLASS NUMBER G254

我国近代图书分编之开端,若按放弃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而采用自编分类体系而论,当以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和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6 年)^[1]为标志,已历百载;若依李钟履划分也有 90 年左右历史。李氏关于图书分编等类目的划分和论文归类等,以今天的标准看,准确性有待商榷;同时,我们发现其统计的论文有重复现象。在世纪之交的今天,

回顾这段历史,继往开来,很有必要。

1 论文数量反映研究状况

根据《图书馆学论文索引》^[2,3]和《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索引》^[4]的连续统计,从清末到 1989 年,我国共发表 4327 篇有关图书分类与编目方面的论文(以下简称论文,见表 1)。

表 1 1900~1989 年各年代图书分类与编目论文概况

起迄年	论文数量(篇)	占总数%	分类文章(篇)	占同年代%	编目文章(篇)	占同年代%
1900—1909	1	0.02	0	0	1	100
1910—1919	9	0.21	2	22.2	7	77.8
1920—1929	203	4.69	56	27.6	147	72.4
1930—1939	496	11.46	187	37.7	309	62.3
1940—1949	59	1.36	21	35.6	38	64.4
1950—1959	261	6.03	169	64.8	92	35.2
1960—1969	128	2.96	70	54.7	58	45.3
1970—1979	118	2.73	74	62.7	44	37.3
1980—1989	3023	69.86	2009	66.5	1014	33.5
年代不详	29	0.67				
合 计	4327	99.99	2588		1710	

表 2 1900~1989 年文章的合作情况与译文统计 单位:篇

起迄年	译文	占总数 %	其 中		2 人合 作文章	其 中		2 人以 上合作	其 中		团体 文章	其 中	
			分类	编目		分类	编目		分类	编目		分类	编目
1900—1909													
1910—1919					1		1						
1920—1929	4	1.65	3	1							4	3	1
1930—1939	40	16.46	15	25	11	6	5	2		2	14	10	4
1940—1949	2	0.82	2										
1950—1959	49	20.16	25	24	11	8	3	3	3		12	9	3
1960—1969	19	7.82	7	12	3	2	1	2	1	1	12	7	5
1970—1979	1	0.41		1	5	3	2	1	1		9	7	2
1980—1989	128	52.67	64	64	146	81	65	31	23	8	27	17	10
合 计	243	99.99	116	127	177	100	77	39	28	11	78	53	25

表 3 1900—1949 年图书分类与编目研究核心作者与知名学者 单位:篇

作 者	分编论文	图书馆学 论 文	其 中			作 者	分编论文	图书馆学 论 文	其 中		
			分类	编目	译文				分类	编目	译文
杜定友	19	118	4	15	0	金天游	4	10	3	1	0
金敏甫	15	37	5	10	5	陈伯遼	4	8	4	0	0
钱亚新	14	33	5	9	2	张秀民	4	7	2	2	0
吕绍虞	12	65	5	7	6	赵荣光	4	6	0	4	0
陈 文	10	10	0	10	0	容肇祖	4	5	1	3	0
张 凤	9	11	0	9	0	徐 旭	3	26	2	1	0
于震寰	8	37	2	6	2	袁同礼	3	23	0	3	0
舒纪维	8	18	3	5	0	严文郁	3	21	1	2	0
万国鼎	8	10	0	8	0	王伯年	3	14	1	2	0
黎锦熙	8	8	0	8	0	戴志寿	3	13	2	1	0
刘国钧	7	29	4	3	0	程长源	3	10	0	3	0
王文莱	7	21	2	5	0	陈训慈	2	27	2	0	0
何多源	7	18	3	4	1	陈东原	2	22	1	1	0
邢云林	7	17	1	6	0	蒋复璁	2	21	1	1	0
李文诒	6	38	0	6	0	李继先	2	20	0	2	0
李 笠	6	6	0	6	0	蒋镜寰	2	14	1	1	0
余少文	5	22	0	5	0	许雪昆	2	11	1	1	0
程伯群	5	12	4	1	0	朱家治	2	10	1	1	0
蒋元卿	5	11	3	2	0	陈鸿飞	2	10	2	0	0
梁启超	5	8	2	3	0	章新民	2	10	2	0	2
霍怀恕	5	8	5	0	0	许振东	1	19	0	1	0
沈祖荣	4	41	1	3	0	俞颂明	1	14	0	1	0
喻友信	4	26	4	0	4	陈独醒	1	13	1	0	0
顾家杰	4	16	2	2	1	郭重威	1	11	0	1	0
沈丹妮	4	10	4	0	1	徐家麟	1	10	0	1	0

从表 1 可见：(1)各年代论文并不平衡，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艰辛坎坷；(2)论文较多的 30、50、80 年代是分编研究的兴盛年代；(3)仅 80 年代就有 3023 篇论文，占总数 69.86%，是分编研究的鼎盛时期。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论文骤减(论文绝大多数是前半年的)；1957 年 6 月开始“反右”，论文猛降 38.4%。社会动荡必然影响学术研究发展。

译文始见于 20 年代，90 年共 243 篇(见表 2)，占总数(4327 篇)5.62%，这一比重并不算高，在分类与编目方面相差不大。译文较多的 3 个年代(30 年代，50 年代，80 年代)也恰是分编研究兴盛年代。

2 从作者群分析看研究状况

粗略统计，90 年间约有 3000 人次参与分编研究，其中 1900~1949 年约 500 人次，1950~1979 年约 300 人次，1980~1989 年猛增至 2200 人次左右，作者群显著扩大。这三个阶段分别有 30、24、44 位核心作者(见表 3~5)。

(1)核心作者选择标准提高，人数反有增加。

(2)多个表中出现者，反映了他们研究的连续性。老一辈专家如杜定友 1967 年去世，其遗作由钱亚新等整理于 80 年代发表；刘国钧 1980 年故去，钱亚新 1950~1979 年论文写得不多，但其与人作嫁，功不可没。白国应、黄俊贵、张玉麟等只见于表 4、表 5，虽然现在都是知名分编专家，但要晚于杜、刘、钱等人。

表 4 1950~1979 年图书分类与编目研究核心作者与知名学者

单位：篇

作 者	分编论文	图书馆学 论 文	其 中			作 者	分编论文	图书馆学 论 文	其 中		
			分类	编目	译文				分类	编目	译文
杜定友	30	36	18	12	0	关家麟	4	9	4	0	0
刘国钧	20	41	11	9	5	于鸿儒	4	6	0	4	0
白国应	16	25	15	1	0	张德芳	4	6	3	1	0
苏大梅	10	20	5	5	10	袁涌进	4	4	4	0	0
黄俊贵	9	14	2	7	0	徐恭时	4	4	3	1	0
阎立中	8	21	1	7	4	张全新	4	4	4	0	4
史永元	8	9	8	0	0	龙廷彰	3	34	0	3	3
皮高品	8	8	8	0	0	张琪玉	3	16	1	2	1
金天游	7	13	7	0	0	顾家杰	3	15	1	2	0
黄景行	7	13	4	3	0	侯汉清	3	14	3	0	0
卢中岳	6	27	5	1	0	何纪华	2	23	0	2	2
丁宏宣	5	18	0	5	0	项弋平	2	13	2	0	0
武宁生	5	12	3	2	2	汪家熔	2	11	2	0	0
张蕴珊	5	8	0	5	0	李枫	2	10	0	2	0
张玉麟	5	6	0	5	0	陈光祚	1	14	1	0	0
肖自力	4	20	1	3	0	范文津	1	14	1	0	1
鲁 文	4	14	2	2	0	李钟履	1	11	1	0	0
李修宇	4	10	2	2	0						

(3)有的作者仅见于一个表，有种种原因。例如，黎锦熙被统计到的 8 篇编目论文仅是这位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300 余篇论文的副

产品；沈祖荣虽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但涉及分编的论文不多；梁启超曾任国立京师图书馆、松坡图书馆馆长，但比起他在其他方面的研

究,分编却是次要的,更因他 1929 年去世,研究遂止;袁同礼和蒋复璁都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但他们 40 年代末离开大陆,论文统计困

难;肖自力发表图书馆学论文不少,但统计到的 4 篇都是与他人合作的;张全新的 4 篇文章都是与苏大梅合作的译文。

表 5 1980~1989 年图书分类与编目研究核心作者

单位:篇

作 者	论文量	作 者	论文量	作 者	论文量	作 者	论文量
李锡初	26	叶千军	12	张欣毅	8	黄 刚	6
白国应	21	徐 文	11	高再其	8	洪 漪	6
鄢德梅	20	蔡振华	11	项弋平	7	罗 进	6
刘湘生	17	皮高品	10	邵国秀	7	李 严	5
万培梯	17	严一桥	10	黄 明	7	杨沛超	5
侯汉清	16	张琪玉	9	卢子博	6	安邦建	5
戴维民	16	曾 蕾	9	张玉麟	6	赵怀生	5
杜定友	15	陶 钰	9	冯锦生	6	俞君立	5
田文清	15	苗绍武	9	罗健雄	6	施占宏	5
钱亚新	14	帅 兵	9	李景正	6	郭 俊	5
黄俊贵	13	倪 波	8	姚行地	6	关声亮	5

(4)杜定友和刘国钧谙于分编,但前者侧重编目,后者分类与译文见长。杜定友正式发表著作 55 种,论文 320 篇,是罕见的高产学者。

(5)有的作者以出版著作见长。例如卢子博、倪波、黄俊贵、罗健雄、林德海等都有书籍出版,但其中有的人论文却不一定多。

多人合作类文章(见表 2)294 篇,占总数的 6.8%,其中,分类方面的合作文章要比编目方面的多。

通过对《图书馆学研究》1982~1993 年介绍的 1263 位论文作者调查统计,有以下结论:

(1)40 岁以下的作者占 58.1%,反映出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以中青年为主力军。

(2)图书馆学研究最大的作者群在高校图书馆系统,其次是公共图书馆系统,相对来说,院系作者群人数不多,但理论水平较高。

(3)从职称上看,以中级职称及助理馆员一副研究馆员间数量大;从学历上看,以大学程度为主。

(4)作者群中以单枪匹马研究方式为主,

但合作研究的潜力很大。

(5)积极参与图书馆学研究是广大女性图书馆工作者的努力方向,把自己的研究引向纵深,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也是女作者的奋斗目标。从统计的各时期核心作者看,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然而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则是女性人数占优势。

3 从分类法类目变化看研究状况

分类法中类目设置要根据文献的实际情况,类目是文献的晴雨表。通过有关类目变化,也可了解分编研究的发展过程。

《人大法》50 年代初即是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分类法。1954 年其“初稿”中“分类与编目”是作为“图书管理”的同一个子类目。1957 年《人大法》第 3 版在“分类与编目”类名下增加了注释:“图书分类法、著录条例、著者号码、书标、标题法、主题表、笔名表、目录排列法、编目字体等入此。”

1958 年《科图法》正式出版,“分类、编目、目录制度”分别用 2—3 级共设 19 个正式类目。对《人大法》第 3 版中的书标、编目字体

等没有采用,将标题法和主题表归入主题目录。

李钟履的类目设置^[5]显然介于《人大法》第3版和《科图法》初版之间。其分类设4个类目,附4个类目;编目设13个类目,附3个类目。但编目中所附“目录学”(其中包括版本学、校勘学等)等在后来的分类法中已不属分编,而归入“图书学”与“目录学”等。

1980年的《中图法》第2版在“图书分类、主题与编目”类中分出图书分类、主题、编目及图书馆目录的使用4个下位类,共设14个类目。又设了“图书学”(版本、校勘等为其下位类)、“目录学”等与“图书分类、主题与编目”为同位类。

1982年《人大法》第5版在分编类目的设置上基本同第3版。南京图书馆则在《中图法》第2版基础上改设,扩大为28个类目。

1990年《中图法》第3版在“文献标引与编目”类名下分5级设44个类目。尤其是“主题法”大为扩充,使其与分类旗鼓相当。

1993年南京图书馆的类目划分更详细,共设83个这方面的类目^[6]。

图书分编与情报检索语言本是同根,南京图书馆1981~1989年列入“情报检索语言”类的论文有90篇,其中1篇次/人的有63篇,2篇次/人及以上的有27篇(戴维民8篇,丘峰4篇,张琪玉4篇,叶千军3篇,余者为2篇),合作文章7篇(2人合作6篇,3人合作1篇),译文11篇。若将这部分统计与前面的合并,论文总数、核心作者人数等都会有增加。

(1)50年代初仅设“分类与编目”一个类目扩展为83个类目,反映了论文数量大增,内容更丰富。

(2)有的类目消亡(如编目费用、笔名表等仅见一次,可见文献少);有的类目划分出去(后来目录学中一部分成为主要类目,一部分成为文献学的下位类);标题法曾是“附录”,后来扩充为与分类、编目并列的类目(名

称有:图书主题、图书主题法、主题词表、主题法等)。可见变化巨大。

(3)同年代论文中分类方面所占比重由最初的0上升到66.5%,而编目方面则由最初的100%下降到33.5%(见表1)。这一方稳步增大,另一方持续缩减,与“主题法”突起不无关系。

(4)类名由分类→图书分类→图书分类与图书主题→文献分类与主题→文献标引的变化,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化。分类法(体系分类法、组配分类法、体系—组配分类法)实际上也是规范的人工语言,出现在手工排检时代,至今其优势还未被完全取代。随着科技发展,人们检索方式与检索内容变化,分类法后又出现了标题法、元词法、叙词法、关键词法及代码语言等多种用于检索目的人工语言或自然语言。计算机网络化出现,硬件与软件不断升级换代,更使检索语言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4 分编研究的新特点

4.1 分类法发展迅速

分类法是文献分类理论研究与类分文献实际操作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反映科学发展状况,又是分类研究集中体现。以下是百年以来一些有影响的分类法在各年代分布状况。

(1)1900年前: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梁启超《西学书目表》。

(2)1900~1909年: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

(3)1910~1919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广西图书馆书目分类简明表》,沈祖荣、胡庆生《仿杜威书目十类法》。

(4)1920~1929年: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桂质柏《杜威书目十类法》,《上海通信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杜定友、蒋经三《革命文库分类法》,《劳动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陈天鸿《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刘国钧《中国图书分

类法》,《东北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福建教育厅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5)1930~1939年:大夏大学《图书分类表》,《安徽省立图书馆中文书目十类法》,《燕京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厦门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裘开明《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中央银行书报材料分类表》,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何日章、袁涌进《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安徽省立图书馆分类法》,程伯群《图书联合分类法》,林凤春《普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宋孔显《中国图书十部分类法》,《(国立)中央图书馆图书分类法》,《集美学校图书分类法》,《(保定)培德中学校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万有文库分类法》。

(6)1940~1949年:杜定友《三民主义图书分类法》,裘开明等《汉和图书分类法》,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7)1950~1959年:大宝第《新时代应用图书分类法》,山东图书馆《图书分类新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范世伟《图书分类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国立北京图书馆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表》,《建筑科学研究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红旗分类法》,《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选矿研究院图书馆科技图书分类法》,一机部情报所《国际十进分类法》,邮电科研院《国际十进位分类法简表:邮电部分》,《中山医学院医学图书分类法》,《北京图书馆地图分类表》。

(8)1960~1969年:《吉林省图书馆图书分类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图书分类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分类法》,上海科研所《国际十进分类法辅表:0类节录类目》,李世杰《佛教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赖永祥《中国图书分类法》。

(9)1970~1979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

类法:简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10)1980~1989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本》,《军事图书资料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中国化工图书资料分类法》。

上述65部有影响的分类法(不含再版)显示20~30年代和50~60年代有两次分类法编制高峰;前者以个体编制为主,比较简单,后者靠群体之力,则复杂得多。

我国分类告别了沿用两千多年的四部分类法,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模仿、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分类体系,由弱小向兴盛发展。如今,分类法已从早期分散逐步集中,基本上形成《中图法》(1990年出第3版,还有《资料法》、《期刊分类表》、《简本》、《索引》等系列)、《科图法》(1994年出第3版)、《人大法》(1982年出第5版,第6版在进行中)三足鼎立之势。据《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简介》1984年5月统计,753个馆中使用《中图法》474个,《科图法》83个,《人大法》52个,自编或其他分类法19个。但由于种种人为因素与分类法自身弱点,我国分类法在目前基础上走向统一是艰难的。

4.2 编目工作与国际接轨

本世纪初以前,我国目录仍采用书本式,1911年后才渐改用卡片式,但编目无定法,依习惯或套用英文图书编目条例。刘国钧将英美编目理论与我国传统目录学结合,1931年首拟《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为一些大型馆采用。1936年中央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发行印刷目录卡片,开我国集中编目之先河。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拟定《中文图书著录条例》,1979年北京图书馆正式出版《中文普通图书统一著录条例》,为全国图书著录标准打下了基础。以《文献著录总则》和普通图书、连续出版物、非书资料、档案、地图著录规则等一系列国家标准制定实施为标志,我国文献标准化工作与国

际上的距离在不断缩小。有影响的编目著作有:

(1)1930~1949 年:刘国钧《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裘开明《中国图书编目法》,何多源《图书编目法》,黄星辉《普通图书编目法》,桂质柏《中文图书编目规则》,楼玉林《中文图书编目法》。

(2)1957 年:刘国钧《图书馆目录》,吕绍虞《普通目录学》,王重民《普通目录学》。

(3)1980~1989 年:倪宝坤《图书馆编目学》,《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图例手册》,李纪有等《图书馆目录》,《〈英美编目条例〉第 2 版简介》,夏文正译《国际标准书目著录(连续出版物)ISBD(S)》,《图书馆编目基础知识问答》,《西文图书编目标准化与自动化研讨会会议录》,《文献著录总则概说》,《〈普通图书著录规则〉例释》,《北京图书馆西、俄文图书编目条例》,《中国机读编目格式》,《中国机读编目格式:附录》,《〈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例释》,《国际标准书目著录发展史研究》,《西文文献著录条例》,《新编图书馆目录》,《西文图书编目与分类》,《科技文献编目》,张玉麟《中文文献编目》,《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SBD(M)专著出版物国际标准书目著录》。

编目著作虽不是很多,但 80 年代十分突出,海峡两岸就有 20 余部专著、教材、译文、条例、论文集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以往各年代不可比拟的。

4.3 分编研究趋向

早期学者如杜定友、刘国钧等对分类与编目研究融会贯通,游刃有余。随着图书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80 年代的作者对分类与编目研究则更加专注。

白国应的研究主要在分类学,其文有综述、讲座、大事记、评论等多种形式,还着重介绍了刘向、刘歆、郑樵、梁启超等人^[7,8]。张琪玉多方探讨体系分类法中的问题^[9,10]。邵国秀对《中图法》中加“0”问题有深入研究^[11,12]。

主攻编目的黄俊贵对著录细小问题穷究^[13,14]。倪波对外国责任者著录见解独到^[15,16]。张玉麟理论结合实际对卡片目录、在版编目等探讨不懈^[17,18]。

钱亚新宝刀不老,研究汉字排检中的部首、笔画、笔形、声韵等一系列问题^[19~22]。

刘湘生主持编制主题词表之余,对主题法史、存在问题及分类主题一体化等有系统研究^[23,24]。侯汉清对主题词、分类法与主题法异同、兼容等有独见^[25,26]。叶千军涉及主题的多方面问题^[27]。曾蕾侧重叙词这种检索语言的推广应用等研究^[28]。

郭俊和洪漪对编制主题词表较专注,前者侧重主题词显示方式^[29],后者深究兼容问题^[30]。张欣毅兼顾分编两分支研究,难能可贵^[31,32]。

今天的研究者要在文献整序诸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谈何容易;且不论文献的多种类型,就整序来说已分为检索语言(可按符号与文字,前控与后控,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等划分成多种类型)与编目等多分支,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当然,这亦反映学科的兴旺。

至于研究内容的变化,有人做过这方面工作^[33],此处不赘述。

5 结语

通过对 90 年来分编研究的回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论文量虽几经起伏,但总趋势是增多;80 年代平均各年度论文量超过以往大多数年代总量,并且比较稳定。

(2)社会稳定是图书分编研究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这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保障。

(3)分编研究的兴盛时期译文也较多,科学发展是没有国界的。

(4)90 年来约 3000 人次参与分编研究,其中 80 年代即有 2200 人,占 73%,核心作者之多是空前的,有大量中青年作者,研究后继有人。

(5)分编方面类目设置越来越多,专指度越来越高,有的还从传统范围中分化出去,反映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分化、扩展和深入。

(6)50年代以来,分类→图书分类→图书分类与图书主题→文献分类与主题→文献标引,这不仅仅是类目名称的变化,而且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丰富,发展的迅速。

(7)分类法日趋稳定,集中。

(8)编目类型更多,并与国际标准逐渐接轨。

(9)作者研究方向由多面转向有重点,由模糊转向明确,由表面转向深入。

总之,80年代是我国分编研究的鼎盛时期。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西学书目表. 时务报, 1896. 8
- 2, 5 李钟履. 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第一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3 南京图书馆. 图书馆学论文索引.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 4, 6 南京图书馆. 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索引: 1981~1989.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 7 白国应. 刘向、刘歆与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一七略. 山西图书馆学刊, 1982(3)
- 8 白国应.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图书分类学的启蒙者. 山西图书馆学刊, 1982(1)
- 9 张琪玉. 体系分类法中的交替法. 图书情报知识, 1982(2)
- 10 张琪玉. 体系分类法中“集中与分散”的矛盾. 图书馆杂志, 1982(1)
- 11 邵国秀. 《中图法》加“0”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河南图书馆学刊, 1985(1)
- 12 邵国秀. 再谈《中图法》加“0”问题的解决方法. 河南图书馆学刊, 1987(3)
- 13 黄俊贵. 关于图书馆目录学基本概念的几个问题. 云南图书馆, 1981(3~4)
- 14 黄俊贵. “著者”与“责任者”初析. 图书馆学通讯, 1986(1)
- 15 倪波. 外国著者的国籍和姓名如何著录. 湘图通讯, 1981(2)
- 16 倪波. 再谈外国著者的国籍和姓名如何著录. 湘图通讯, 1981(4)
- 17 张玉麟. 我国图书在版编目工作概况. 图书情报工作, 1989(4)
- 18 张玉麟. 谈谈对藏书目录的“订正”问题. 图书情报工作, 1982(1)
- 19 钱亚新. 试论汉字部首排检法的标准化问题. 图书情报知识, 1985(4)
- 20 钱亚新. 试论汉字笔画排检法的标准化问题.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85(3)
- 21 钱亚新. 试论汉字笔形排检法的标准化问题. 广东图书馆学刊, 1988(4)
- 22 钱亚新. 试论汉字声纽、韵目排检法的标准化问题.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89(2~3)
- 23 刘湘生. 主题法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概述. 云南图书馆, 1981(2)
- 24 刘湘生. 分类主题一体化是我国情报检索语言的发展方向. 北京图书馆通讯, 1987(4)
- 25 侯汉清. 叙词表的兼容与互换. 文献工作研究, 1989(1)
- 26 侯汉清. 也谈分类法和主题法的异同. 情报科学, 1983
- 27 叶千军. 与学科和文献形式相应的主题特点之研究.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88(1)
- 28 曾蕾. 我国当前推广应用叙词语言的若干现实问题. 北图通讯, 1985(2)
- 29 郭俊. 属分关系显示方式的比较. 情报科学, 1989(1)
- 30 洪漪. 汉语叙词语言的兼容问题研究. 图书情报知识, 1988(2)
- 31 张欣毅. 对图书分类法“三性”的重新认识.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 1981(3)
- 32 张欣毅. 提高目录质量和经济效果的有效措施: 谈谈加强目录间的有机联系. 湘图通讯, 1981(3)
- 33 白国应. 图书馆图书分类研究综述. 见: 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9

文榕生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馆员, 已发文 30 余篇, 出版专著 2 种. 通讯地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 27 号, 邮编: 100710.

(来稿时间: 1995—03—11. 编发者: 黄文田.)